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2.026

■ 文史研究

殷海光现代知识分子观述评^①

杨铮铮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殷海光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入观察和了解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批判传统主义,引入自由主义,通过对传统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吸收和反思,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的同时,也重新思考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资源,试图在知识和人格的基础上为现代知识分子建立其社会的立足点。尽管殷海光已经是20世纪的人物,但他对知识分子的这些论述,而今看来依然有其跨世纪的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殷海光;知识分子;失落;德操;真理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2-0151-05

Review of Yin Hai – guang’s Opinions about Modern Intellectual

YANG Zheng-zh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in – depth observations and understanding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Yin Hai – guang reflected profoundly on China’s intellectual. He introduced the liberalism by criticizing the traditionalism. Through both absorptions of and reflections on traditionalism and liberalism, he tried to find out the outlet for the Chinese culture. He also rethought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historic resources, attempting to establish its social standpoint based on the knowledge and the personality for modern intellectual. Although Yin Hai – guang was a figure in the 20th century, his opinions about the intellectual is still of its cross – century significance, worthy of our further thinking.

Key words: Yin Hai – guang; intellectual; loss; morality; truth

殷海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于台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第二代西化派伦理思潮的代表人物,自称是“五四后期人物”,毕生以弘扬五四精神,批判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开展思想启蒙为已任。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需要通过对中国近百年来知识分子的理解,重新反思自身在新时代中的使命。在他的自由主义的框架之中,他是如何理解中国近现代知识份子的历史传统,并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加以新的阐释的呢?这是本文讨论的中心所在。

一 知识分子的历史语境

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呈现出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正

① 收稿日期:2013-10-04

作者简介:杨铮铮(1980-),女,湖南湘乡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是如此。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必须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中才能加以讨论。知识份子一词的现代涵义,在西方思想中出现较晚,也许只能溯源于俄国沙皇时代因受西方启蒙运动的激励而出现的知识阶层。这一阶层具有几个特性:一是知识水平比较高,二是社会关切非常强,三是在政治之外来批判和参与政治。

殷海光先生在其遗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以下简称《展望》)中,在对中国文化进行前瞻性设想的同时,也凝聚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身的深刻反思。他在书中列举了美国《时代周刊》提出的知识分子的两个定义:一,知识分子不止是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二,知识分子必须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如果按照《时代周刊》所举的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么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即使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数。因此,殷海光同时又采用了海耶克的想法: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事物接受得比一般人来得快。殷海光认为《时代周刊》所界定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而海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主干,前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前锋,后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因此,在殷海光心目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是:知识分子乃以思想为生活的人,他们的任务是为传承文化和创建现代化文化,是“搞观念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们好恶情绪的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其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对他是否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粮食”。旁人对他的诽谤,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依此推论,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耐不住寂寞而不能抱持真理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1]544}。在此殷海光界定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基本职能。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是启蒙事业,而“启蒙”(lightening)一词,从其词源来看,即具有“照亮、点亮”之意。故此,殷海光把知识分子比喻为“时代的眼睛”,担负的是照亮一个时代的重责:“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我们要使这双眼睛光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1]543}

二 知识分子的失落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近代和现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曾经扮演着新时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然而,曾几何时,面目全非,斯人憔悴!如今,一部分知识分子飘零海角天涯,一部分知识分子被穿上紧身夹克,一部分知识分子过着蹇蹇淡漠的岁月。这是一幅秋末的景象。凉风起天末,草枯木黄,无边落叶纷纷下。只有三几片傲霜叶,高挂枝头,在寒风里颤抖,任漫步怀古的诗人悲吟^{[1]546}!这是殷海光在《展望》中,为中国近现代“搞观念”人文知识分子所画的一幅萧瑟秋风图。观图遣怀,殷海光不禁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近现代“观念人物”悲惋长歌,落下重重的感叹:“中国知识分子是失落了!”殷海光认为,知识分子这双“时代的眼睛”处在一个“一般的失落”(即普遍性的失落)状态。

何以失落?殷海光指出:“这一大变化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因素造成的。这一大变化是与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而为时代的变化之一环”^{[1]546}。这里的“时代的变化”是指从清末到一九四九年这期间的历史风云变幻。如今,又是几十年的时代变化过去了,奇怪的是,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不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走出失落,他们似乎在一个失落的怪圈中循环。在分析知识分子失落的原因时,殷先生指出了在知识分子观念中存在的几个重要原因:第一,与传承脱节。第二,与社会及家庭脱节。第三,与经济来源脱节。第四,与现实统治建设及行动人物脱节。有这么多的脱节,于是知识分子纷纷变成脱节人。这些原因,又何尝不是现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失落的一部分原因。当然,知识分子失落的原因不仅仅是他们的观点的问题。

殷海光又从文化与社会变化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之成因,作了着力分析。他说,中国近

现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种“边际人格”，这种边际人格的形成实乃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急剧变动的反映。在这个时代，不是旧的去而新的没有来，而是旧的还没有来得及退去，而新的又大量的涌入。旧的和新的，同在一个中国文化人身上打起仗来。于是，一个一个的人成为中西文化的战场，整个社会也沦为中西文化的战场。战场是不易稳定的，因此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也不易稳定。他们时而保守，时而前进，时而左向，时而右转，时而极端，时而折衷。这就是殷海光从文化与社会变化这一视角，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思想急剧多变提供的说明。然而，如果说边际人格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过渡时必然伴随的社会现象，那么，中西文化观念之冲突及中国文化之特质，更为这一转型染上了悲剧的色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泛道德主义和泛政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种“崇古”以取向，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前提上必须唯道统是遵，在行为模式上必须唯古制是守。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个制度的培养和鼓励下离开“先王之法”，来自动创造方法以解决人和社会的实际问题。这种文化物质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采取的“要变”、“趋变”取向相冲突和抵触，这种冲突是根本性的，它给不止一代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制造内心的分裂、焦虑和心理上的巨大挫折。

这种心理的焦虑和挫折，其直接的严重后果表现为知识分子的失落，在社会中成为脱序人。按殷海光的分析，中国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动，带有浓厚的群众运动的色彩。群众性的运动的发展趋向一般经由三个阶段：宣传、组织、新的权力形态的出现。在运动的前两个阶段，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狂热之士”和“观念之士”；在第二个阶段，常有一种潜在的行动人物隐身在组织中，他们职卑位微，不为人所注意；到了第三个阶段，如果有新的权力形态出现，那么这类潜在的行动人物可能脱颖而出，成为实际的行动人物。殷海光认为中国近几十年，实际的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之间的悲欢离合有发人深省之处。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里，根本就没有培养出西方意义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知识分子。小而言之个人的名位利禄，大而言之对国家、社会、伦敦的责任感，在都难使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绝缘。在这一关节上，中国知识分子享有比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往往遭受比较特殊的挫折。自清末以来，社会文化的动乱逼着他们纷纷走出书房，他们对社会对国家有传统的道德责任感，“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这些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发酵，促使他们拼命去追求民族诸大问题的解决。可是，他们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由于能够谈“思想”以作鼓励，在运动的初期颇得到实际人物的借重，因而这两种人物大致可以相处得不错。可是，等到新的统治结论出现以后，现实的问题逐渐来临，理想的问题逐渐退色，“理想”、“真理”常常随着权威和实际的需要不断翻修，随着这一转变，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无法不起分化，在观念人物中，比较能放弃理想而自认为目的已实现的人又变为辅治阶层；比较坚持原有理想而又天真的人慢慢滋生一种被诱拐的感觉，但他们依然满怀这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焦虑，走进了失落^{[1]549}。

另一方面，就近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而言，他们根本没有可以独立的社会经济基础，远离现实，离世独立，又能隐到哪里去？隐在何处有人养活你？知识分子与经济来源也脱节了。

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只在“离开”和“逃避”中选择自己的出路。他们因袭着凉薄的失落感，探寻于知识和真理的崎岖山路上，企图在另一个价值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脱序，导引着知识分子走向非洲的原野，有许多人轰轰烈烈，或者，有许多人悲壮的死去。在一些角落地，也有许多人无精打采地挨日子，脱序者的生命在灰色中打发过去^{[1]554-555}。

三 知识分子的出路及责任

对于脱序的知识分子，殷海光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心情却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承认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应该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时代催生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正视历史和现状，承认知识分子难以独立肩起建立新社会的重担。他认为知识分子终究是以“观念”为生活的人。他说：“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那

么如何从这失落中去自救呢,他写道“我们如果拨开眼前的云雾而看到前景,如果对人生持执道德的肯定态度,那么就可以从失落里自救了”^{[1]555}。殷海光在回答“什么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怎样才能使中国有个光明的远景?”时浓缩了八个字:道德、民主、自由、科学。

只有实现这四个目标,中国才有希望。我们要实现这四目标,必须积极地努力对新的文化创建,必须有健全的知识分子作努力。怎样的知识分子才算是健全的知识分子?殷海光认为一个知识分子要走出失落成为一个健全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在日重享受和竞争的现代生活中,如殷先生所说,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中谈道德,不是被人认为迂阔,就是容易被人认为虚伪。的确,在谈道德的人物中多的是这两种人,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要道德。有没有人因为市面流行假钞票而根本不用钞票?稍一反思,现在的道德问题实在是严重,知识分子靠什么在这迷茫失绪、人事变化多端的世界里作定力,我们能把握这什么?我们必须怎样才能免于失落,站稳脚跟?殷海光在这里指出知识分子如果想要免于脱序,最核心的需要是始终维持自同(selfsameness),是保持内部坚固(innersolidarity),是静悄悄地做自我综合(ego-synthesis)。这就需要德操做中主了。我们身处在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只有坚固道德的完整,方可收敛散漫的心灵。只有照着道德原则的指标走下去,才可免于掉进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鳄鱼潭^{[1]566}。对道德操守的强调,显示了殷海光与传统的深刻联系。

同时,殷海光指出,中国的传统一向是知识分子乃社会的指南针。是非被保持在知识分子那里,而且真正的知识分子把是非之际看得非常严重。正因此故,每次大乱过后总可以保持一点命脉。清末以来,政事议论,国家打击,也莫不以士流清议为重。行动人物有时也以知识分子的是非为是非。但是近几十年来,逐渐搞到了头,知识分子逐渐放弃自己的见地,让出自己的思想主权,以行动人物的是非为是非。时至今日,知识分子之间也似乎愈来愈彼此陌生,早期知识分子之同那种真诚的反对和赞成愈来愈微茫,若干知识分子狂热追求个人的煌大,远甚于追求真理,彼等一般的对个人声名的饥渴,远甚于对真理的渴求。现代生活日重享受,彼此之同的竞争不可避免。个人的现实需求挤走了对无关利害的客观真理之追求。这一趋势把人们的思路引向一个死巷子:一切思想言论几乎已无客观标准可言。一切思想言论都依人事关系解释。把一时流行的意见当是非的准绳,而思想则随着流行的音乐打转。所以,知识界成为一个失血的人,他除了制造大量的统计数位以外,剥落了昔日的光和热,更未能给人以新的展望^{[1]570}。知识分子是一般地失落了,殷海光告诉我们要救起知识分子还只有知识分子自己,努力于知识和真理的探求仍是知识分子的中心的任务。从一个长远的过程和根本的培养来说,一个社会文化还有什么比知识和真理更为重要呢?知识分子要想在这个社会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不要随波逐流,失去自我,仍需要保持清醒的心灵,常能和寂寞为友,甘于现身于真理的追求,富贵可以购买金山,但买不来一条定律;权势可以毁灭人的身体,但是毁灭不了真理^[2]。有而且只有这样的真理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殷海光在这里实际上是划分开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为了避免传统的知识分子缺乏自身的立足点,而被政治所否定,他将现代知识分子的立足点首先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人,只能对学术上的真理负责。这样的知识分子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而对知识和真理的关注,又显示了殷海光作为一个现代启蒙者的历史自觉。

反观殷海光自身的经历,不难发现其知识分子的这些特质在他身上有明显体现。何卓恩评价说:“也许,殷海光受‘子曰诗云’式的教育并不多,‘国学’根底不及博学鸿儒深厚,但是,若论支撑其人生理想的主要精神动力,士大夫传统对于他的意义,绝不逊于对以复兴儒学为鹄的的新儒家们的意义。”^{[3]47}殷海光对观念的执着追求,决定了他是一位独立卓行,却又异常孤独之士。他曾说:“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他的一生正是为了他的自由理念和道德价值的实现而奋斗,就此而言,他体现了一种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典型。可以说他自己即以不寻常的道德热情和责任感为当代的知识分子作出了表率。

在为中国知识分子开出医治心灵的药方以后,殷海光接着又提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对文化应承担的责任。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是出在社会文化上,于是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从社会文化入手,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面前首当其冲。因此,他们有必要也有义务在世界的环境之中来研究此类问题。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创建新的社会文化,也就是要建设一个更适合于人生存和发展的现代文化,使我们的社会从目的社会(telocratic society)走向波普尔(K. Popper)所说的开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再受无谓的权威、禁忌、神话的束缚,而是以合于人的自身的德目和理知为目的。知识分子从事这一宏大事业的创建时,要抱有“为万世开太平的”的胸襟铺路,透过现代文化的默行力,消解社会的种种问题,出现一个重道德、有自由、行民主的新的景象。

四 评价

从殷海光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论述来看,他的思想有许多可取之处。

首先,殷海光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作了清晰的界定。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人,尤其是作为社会文化承担者的知识分子,他们应该关切政治、参与社会事务、注重对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同时还要在社会各个领域起到转化社会风气的作用。殷海光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是身体力行的,他在《中央日报》任主笔,反思国民党的专制,抨击国民党的弊端,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次,殷海光在对现代中国历史的深入观察和了解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他通过对传统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吸收和反思,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的同时,也重新思考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资源,试图在知识和人格的基础上为现代知识分子建立其社会的立足点。

当年殷海光先生对年轻一代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替我们与近代早期知识分子传统建立一个精神桥梁,重建五四的思想道路。今天我们重新来看他的知识分子观,发现现代社会并不缺知识分子,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已不再是少数人,但他们却主要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这就是现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有机型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往往为特定的阶级或工商企业服务,为他们说话。有机型知识分子一般是专业技术型知识分子,他们服务社会时,难免受专业知识的局限,缺少那种人文价值所培育的通识,无法看到社会长远均衡发展的需要。知识分子本是一种超越于一切利益集团的,自我定位于追求普遍真理的群体,但当他们很明确的把自己的立场与某个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挂起钩来,那就成了“有机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现在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都相当普遍,散布于社会各个层面,而且有领导社会、主持政府的趋势。这种情形与现代社会失去大方向而且有畸形发展的危险很有密切关系,因此,近年来中西方有识之士呼吁现代社会需要“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要有关怀,同时又能超越专业知识的局限,以通识来认识社会需要,为社会说话,这种知识分子与殷先生常年所树立的知识分子典型是很相近的^{[4]323}。

今天面对有机型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所造成的危机,以及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声,更使我们怀念殷海光先生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树立的风范。尽管殷海光已经是20世纪的人物,但他对知识分子的这些论述,而今看来依然有其跨时代的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殷海光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时的深度和眼光,是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应该吸取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 [1] 殷海光. 中国文化的展位[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 [2] 彭文刚. 知识分子的启蒙形态与当代使命[J]. 学习与实践,2012(2):134-140.
- [3] 何卓恩. 殷海光与中国自由主义[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 [4] 张 灏.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